

革命意志不能衰退

河北省赵县第一任县委书记——蔡志杰

蔡志杰，1922年11月生，河北省深县人。1938年6月参加革命，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5月任深北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1945年4月任六地委宣传部宣传干事；1945年7月任晋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1947年11月至

5月4日，记者一行来到赵县。在党史办马立宁、郭广端等同志的协助下，查阅了相关党史资料。据资料显示，赵县新中国第一任县委书记叫蔡志杰，于1948年下半年任赵县县委副书记、书记。

与安逸思想斗争

1948年，蔡志杰任赵县县委副书记、书记时，赵县已经解放，经过土地改革，农民分得了土地，部分党员干部出现了居功自傲、半截革命的思想，并产生了“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安逸思想。据资料记载，在蔡志杰的领导下，中共赵县县委组成整党整干领导小组，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著作，呼吁大家认识到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还须不停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1949年10月，在蔡志杰的具体指导下，县委成立干部补习学校和临时党校，党校定期对党员干部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培训，由县委理论教师讲课，努力发展文化教育，开展民主建政，一些想退休回家的同志自觉检讨，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蔡志杰在上级党组织领导下，团结县委一班人，带领全县党员干部，发挥模范作用，进行国民经济恢复工作。他首先解决了翻身农民生产资料不足的问题，引导农民自愿参加不同形式的帮工、换工、互助合作组织，开展大生产运动。

群众心中的廉洁干部

5月5日上午，在赵县老干部活动室，许多年过七旬的老人都对蔡志杰书记有些印象。曾在县商业局工作过的张春山老人回忆说：“蔡书记在群众中是个非常廉洁的革命干部。工作能力很强，为人没有架子，很有亲和力。可惜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对一些革命干部的资料收集整理工作没有专人负责，没有留下多少有价值的文字资料。”80岁的张锁贵老人，16岁开始在县公

1948年12月任晋县人民政府县长；1948年12月至1952年10月任赵县县委副书记、书记；1952年10月，调到邯郸工作，曾任中共邯郸市委第二书记，政协邯郸市第四届委员会主席，党组书记等职。1994年11月25日逝世。

安局工作，曾在《战友报》当过记者，转业后在县水利局工作。得知记者为追寻赵县新中国第一任县委书记而来，非常激动地说：“当时的县委书记真是一心想着老百姓，他们不怕吃苦，吃饭在老百姓家，下乡坐马车。”张老喜欢搜集赵县的历史资料，曾整理过关于赵县新中国第一任县委书记的相关资料。在老人家里，大量的文史资料成堆地摆放着。据张老回忆，1950年1月，蔡志杰实行“查田定产，改造负担”，改变了统一累进税制，按土地优劣，评定负担亩，按亩担亩计税。同时期建立农业和工商税的减免制度等政策。

同时，县委积极执行中央《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和《关于统一管理1950年财政收支的决定》的方针，实行统收统支，所有主要收入一律上缴中央，地方开支由中央核定，按月逐级拨付，年终结余全部上缴。蔡志杰还结合农业互助合作等运动的开展，根据“小心谨慎、有领导、有计划地个别吸收”的原则，特别注意在机关团体、工厂企业、农村、贫雇农中吸收觉悟高、思想纯洁、工作积极的人入党，改变了基层党组织薄弱的状况。党员干部抵制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克服了居功自傲的情绪，振奋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重视群众文化生活

张锁贵老人回忆，蔡志杰有俩儿俩女，老伴也健在，只是许多年没有联系了。记者在石家庄市委党史研究室一处处

长马艳丽的帮助下，联系到了蔡志杰的妻子刘荣娟。

刘荣娟老人回忆，蔡志杰十分重视民间文化事业。记得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赵县的剧团都是个人经营，剧团因无党团组织，管理差、问题多，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为了促进戏曲事业更好地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服务，老蔡对整顿改建剧团作出周密、妥善的研究，他亲自挂帅领导学习，提高艺人的思想觉悟，树立主人翁的意识。”

“在老蔡的领导下设了工作小组，在剧团内进行思想工作，边演出、边学习、边整顿。老蔡没少为剧团的发展费心劳神，我多次陪同他与新艺京剧团主演黄少华谈心。1951年，赵县京剧团终于正式成立。”刘荣娟老人说。

据刘荣娟老人回忆，后来黄少华离团，县委专门召开会议，邀请了比黄少华更有名气的主演于至云、王则昭等。“在老蔡的亲自关心下，全团上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剧团名气越来越大，每当有大戏，周围十里八乡的人都来赵县看戏。”提到赵县京剧团时，县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朱涛说：“听老人们讲，过去赵县京剧团很有名气，用现在的词形容那就是‘一支靓丽的奇葩’。”

赵县人民高度评价蔡书记

虽然蔡志杰在赵县担任书记的时间不算长，但他却在赵县人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赵县文史资料中有一段对蔡志杰的评价：

蔡志杰同志参加革命工作以来，时刻以革命利益为重，听从党的召唤，服从组织安排，工作雷厉风行、刻苦认真、扎扎实实、一丝不苟，不计较个人得失。为党的事业勤勤恳恳、兢兢业业、鞠躬尽瘁，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蔡志杰同志坚持原则，作风正派，光明磊落，爱憎分明，严于律己，廉洁奉公，顾全大局，遵纪守法，平易近人，关心同志，助人为乐，对同志直爽、坦诚。一贯常念人之功、善谅人之过。严格要求亲属和子女，德高望重，深受人民的尊重和爱戴。（摘自2011年7月14日《中国县域经济报》，作者为王长兴、郑彬）



（上接1版头条）

从历史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民为本、世界大同的理念，同时又对其实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把以民为本转化为以人民为中心，把世界大同转化为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至上，超越了西方式现代化道路中资本至上的所谓“资本主导”逻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主—主”平等的哲学思维，主张兼济天下、协和万邦、美美与共的和谐世界的逻辑，超越了西方式“主—客”二分的哲学思维与“西方中心论”所生长出“国强必霸”的逻辑。

从现实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开辟出来的。文明的发展状态如何，取决于“道路”状况如何。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致力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注重物质文明建设。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一步注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进而注重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协调发展，再进一步注重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协调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就更加明确注重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当今，我们所讲的物质文明，在人与物的关系上，是让全体人民共享物质文明成果与注重人的全面发展；所讲的政治文明，在党与人民的关系上，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所讲的精神文明，在精神本体上，强调勇于奋斗精神；所讲的社会文明，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注重人与人和谐相处；所讲的生态文明，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总之，基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我们创造性地铸就出了一种整体性文明，创新发展了人类文明。

从理论来看，“文明”从来都是与“道路”紧密相关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蕴含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因素，能内在生长出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历史方位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强调与时俱进，具有开放性、创新性，它不是西方式的唯我独尊，而是向未来开放、向世界开放，积极吸收

（上接1版二条）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为贯彻落实历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的过程中，均通过不同阶层、民族、区域和界别的代表参政议政，集思广益，根据西藏实现稳定发展战略目标最终制定符合特殊区情的法律法规和形成决策政策，最大限度地既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又兼顾到少数人的利益诉求，将各方面的利益汇聚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这一奋斗征程上来。同时，作为专门协商机构，西藏自治区政协自1959年成立以来，广大政协委员以及爱国上层人士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广泛团结各族各界人士，在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夯实基础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全过程融合生长，实现了西藏社会的和谐稳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但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将人民民主贯彻于党经略西藏的全过程一定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众所周知，政党制度是现代民主制度的轴心，没有政党制度，现代民主制度是不能运作的。只有将政党制度有效地嵌入国家制度体系，并融为一体，人民民主才能得到巩固与发展。党内民主建设贯穿于党成立100年来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个历史时期。党内民主的建设完善不仅是建设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关键内容，而且有效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

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并不断创新发展的文明；在奋斗目标上，注重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它不是以资为本，而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文明；在总体方略上，注重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有领域的边界性，更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它不是“单向度的发展”，而是注重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各自高质量发展与它们之间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谐发展的文明；在推动力量上，注重发挥并整合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力量、市场配置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具有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积极因素、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质和优势，它不是特意强调资本的力量，而是注重世界人民共商共建共享并汇聚磅礴合力的文明；在领导力量上，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是具有人类视野和世界担当的政党，注重解放全人类，为世界谋大同，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重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具有道义性和普惠性，它不谋某种特殊集团的利益，而是谋世界大同和世界人民利益的文明；在世界观上，强调以多样和统一辩证的观点观察世界，既强调世界多样、道路多样、文明多样，具有多样性，也注重共同性，它反对“西方中心论”“霸权主义”“单边主义”，是主张国家平等、文明互鉴、包容发展、互利普惠的文明。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立足当代中国与人类社会，内在具有“人类性”，是解析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典型样本，蕴含着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这种文明不仅积极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及其带来的世界不稳定不确定，致力于解决当今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发展失衡、治理滞后三大难题，而且在世界动荡变革期，它积极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这种文明遵循规律性，突出共同性，倡导普惠性，坚持多样性，注重协调性，突出共建性，因而是当今世界人类文明中符合时代发展趋势、具有光明前景、正确引领时代潮流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

（作者系原中央党校校委委员，中央党校一级教授，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

权、表达权、监督权。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的社会大局更加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牢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保障作用是分不开的。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谱写了雪域高原发展的新篇章。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伟大实践，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鲜明特征和显著优势。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全面贯彻落实，广大人民群众实现了由“会说话的工具”到国家主人的转变；全地区生产总值由1951年的1.3亿元增长到2020年突破1900亿元；人民群众的生活实现了由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到历史性地摆脱了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跨越，人均预期寿命从1951年的35.5岁提高到了71.1岁。同时，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事业全面进步，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稳定提升。

实践证明，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才能保障西藏各族人民的民主权利。我们深信，随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不断健全完善，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奋斗目标一定能够实现，必将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及边疆民族地区的建设贡献更为成熟定型的中国智慧和方案。

（作者系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阵地七勇士”： 成功发射我国首枚核导弹

雷 柱 杨明月 郑伟杰

1966年10月27日，我国“两弹”结合试验取得圆满成功，震惊世界。

当罗布泊上空升起巨大的蘑菇云，人们并不知道，在距离发射台仅100多米远的地下控制室内，有7名官兵正经历着一场“生死考验”。倘若发射失败，他们将全部牺牲在这个几平方米的地下室。

他们7人是谁？40年后，这个谜团才慢慢解开，他们是第一试验部政委高震亚、参谋长王世成、发射二中队中队长颜振清、技术助理员张其彬、加挂技师刘启泉、控制台操作手佟连捷和徐虹。

“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如今，“七勇士”当中的一员、70多岁高龄的徐虹老人回忆起当年执行任务的场景，仍然满怀激动：“那天上午7时40分，经指挥部批准进入地下控制室，我们每个人都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聂荣臻元帅前来接见他们。当时尚未入党的徐虹哽咽道：“如果我牺牲了，请组织追认我为党员，并把我的全部津贴作为党费上交。”

“死就死在阵地上，埋就埋在导弹旁！”呼啸的烈风中，7名同志吼出的誓言，在戈壁大漠上空久久回荡……

“地下控制室完全密闭，呼吸十分困难。”徐虹身体本来就不好，连饭都吃不下；佟连捷已经连续几天拉肚子，面色蜡黄。此时，大家完全顾不上这

些，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每一个操作动作上。

8时45分，发射进入15分钟准备阶段。王世成和颜振清到阵地上进行了最后一遍检查，又迅速返回到控制室。

高震亚是7人中职务最高、年龄最大的，他冷静地作临射前再动员：“就是出了天大的事，也要顶住，争取最后的胜利，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

此刻，距离发射时间只剩七八分钟，时间开始变得漫长而胶着。大家激动又紧张，一遍遍轮流检查着设备状态。

9时10秒，随着王世成“点火”口令的下达，佟连捷果断按下发射按钮。霎时，一声巨响，核导弹喷着浓烈的火焰，腾空而起。

地下控制室却变得异常安静，大家凝神屏息，周围空气似乎凝固起来。几分钟后，弹着区传来激动人心的声音：“核弹头在靶上空预定高度爆炸，试验成功！”霎时，小小的地下控制室沸腾了。7人热泪盈眶，握手拥抱、振臂高呼：“成功了！胜利了！”

颜振清迅速拆下点火接线板，用钢针在上面刻下了一行具有纪念意义的文字：“核导弹于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九时在五十号场地发射成功！”

“七勇士”从地下控制室爬出来，没走多远，就看见人们如潮水般欢呼着向他们涌来。

（摘自2021年7月1日《解放军报》）



忠心耿耿，为党为国 关向应：

李树泉

关向应，1902年出生于辽宁省金县（今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1922年，他进入大连泰东日报社工作，在共产党员李震瀛、陈为人的影响下，开始接受马列主义的熏陶。

1924年4月，关向应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5月，他来到上海，从事革命工作，并入上海大学深造。年底，按照组织的安排，他前往莫斯科求学。临行前，他给叔父去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愿终身奔波，竭能力于万一，救人民于屠（涂）炭，牺牲家庭，拼死力与国际帝国主义者相反抗，此侄素日所抱负，亦侄唯一之人生观也。”1925年1月，关向应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

五卅运动爆发后，关向应从苏联归国，先后在上海、山东等地从事工人运动和共青团工作。1928年6月，他在莫斯科出席了党的六大，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会议结束后，关向应回国，辗转上海、武汉等地从事革命工作。

1931年，因叛徒出卖，关向应在上海不幸被捕。在狱中，虽然受尽酷刑，但他始终坚贞不屈，咬牙坚持不暴露自己的身份、不泄露党的秘密。近8个月后，经党组织积极营救，他被保释出狱。

出狱后，关向应来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任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委员、湘鄂西军事委员会主席、红三军

政治委员，与贺龙并肩作战。贺龙、关向应二人也在战斗中相互了解、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创造了我们党军历史上高级干部肝胆相照、精诚团结、长期合作的光辉典范。

抗日战争爆发后，关向应任八路军一二〇师政治委员。为贯彻落实党中央提出的“深入敌后，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他与贺龙率部东渡黄河，开赴山西，坚持华北抗战，点燃了华北的抗日烽火。

然而，关向应积劳成疾，被重病击倒。在党中央的反复催促下，1941年秋，他回到延安休养。1945年，他虽因病未能出席党的七大，但仍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4月24日，病重的他给党中央写下一封告别信：“全党全军应该像一个人一样，紧密地团结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中央周围，相信我们的党和中国革命是一定要得到最后胜利的。”言语之间，充盈着对党、对革命的赤胆忠心。

1946年7月21日，关向应在延安病逝，时年44岁。直到呼吸停止前5分钟，他仍以微弱的声音说：“不要紧，我还会活下去，继续为党工作……”斯人已逝，精神永存！毛泽东为他题词：“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向应同志不死。”这是对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的赞颂，也是对他光荣革命生涯的最好祭奠。

（摘自2021年第3期《党建》）